

# 南社文人與日本

陈春香 著

姚英中



創于1897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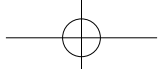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后期资助项目

# 南社文人与日本

陈春香 著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3年·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南社文人与日本/陈春香著.—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3

ISBN 978-7-100-10161-5

I.①南… II.①陈… III.①南社—文学史—研究 IV.①I209.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74159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 南社文人与日本

陈春香 著

---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山西省美术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10161-5

---

2013 年 10 月第 1 版

开本 889×1194 1/32

201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张 14 1/4

定价:42.00 元

# 目 录

序 言 .....	1
绪 论 .....	5
第一章 苏曼殊与日本 .....	27
第一节 苏曼殊早期文学活动与日本 .....	29
第二节 苏曼殊的外国诗歌翻译与日本 .....	51
第三节 苏曼殊诗歌创作中的中国传统与日本意象 .....	65
第二章 高旭与日本 .....	82
第一节 高旭的新思想接受与日本 .....	86
第二节 高旭与吉田松阴 .....	103
第三节 高旭的涉日诗歌 .....	122
第三章 马君武与日本 .....	145
第一节 马君武在日本 .....	148
第二节 马君武的外国文学译介与日本 .....	155
第三节 马君武的非文学译介与日本 .....	173

第四章 郁曼陀与日本 .....	185
第一节 郁曼陀的日本诗缘 .....	189
第二节 《东京杂事诗》描绘的日本 .....	205
第五章 南社其他作家与日本 .....	220
第一节 从《蒙边鸣筑记》看叶楚伦的日本认识 .....	221
第二节 陈去病、柳亚子的戏剧观与日本 .....	240
第三节 田桐及其《扶桑诗话》 .....	259
第四节 景梅九与日本 .....	288
第六章 南社的国粹主义与日本 .....	305
第一节 南社与国粹派 .....	306
第二节 中日国粹主义之关系 .....	322
第三节 《政艺通报》、《国粹学报》与《日本人》、 《日本》 .....	343
第七章 南社的国民性批判与日本 .....	357
第一节 中国的国民性批判与日本 .....	359
第二节 《觉民》月刊的国民性批判 .....	381
第三节 南社作家创作中的国民性批判 .....	393
余 论 南社诗歌与日本明治时期的汉诗 .....	401
参考文献 .....	419
后 记 .....	440

# 序 言

王向远<sup>①</sup>

《南社文人与日本》是作者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完成的一部书，也是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后期资助项目，现在就要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作者陈春香教授让我来作个序。我是个南社研究的外行人，本来是没有资格作序的，但我作为当初博士论文的指导教师，作为《南社文人与日本》最早的读者，对本书及其作者都很熟悉，承作者雅意，占用序言的宝贵位置，向读者做一简单介绍，兼谈我的一点感受。

回顾我十几年来所指导的博士论文中，其中《南社文人与日本》是让我最“省事”的论文之一。当然，作为指导教师，对博士生及其论文写作，费力操心都是应该的。但对春香的这篇论文，我实在没费多少心力。先说选题，对博士论文写作而言，“写什么”比“怎么写”往往更令人踌躇不决，是否找到好的、有价值的选题，是论文成败的关键。《南社文人与日本》这个选题最初是春香自己提出的，这个选题甫一提出，就与我一拍即合，因为它的学术价值与重要性是不难判断的。此前的研究，无论是南社研究，还是中日近代文学关系研究，对南社与日本的关系固然有所涉及，但系统、全面、深入的研究成果却一直付之阙如，因而很有必要填补这一空白。

---

<sup>①</sup> 王向远，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在论文的写作过程中,春香教授也是一板一眼、稳步推进,从来没有让我站在旁边着急捏汗。在整个过程中,相关的研究成果陆续发表,也让我很是放心。当然,这是我在旁观者角度上的观察。实际上她在写作过程中所付出的辛苦与努力,恐怕是一般的三十来岁的年轻博士生所不能比的。在她这个年龄,上有老、下有小,内有家、外有校,一边攻读博士学位,一边自己还要承担所在学校的课程、并指导着硕士研究生,事情多、压力大是可以想象的。在北师大文学院攻读博士的三年多时间里,她要经常在北京与太原之间奔波。但更多的时间,她是待在各大图书馆里读书,查找资料。她曾多次跟我说过:北京各图书馆的关于南社的资料,她基本上都翻遍了。细心的读者可以看出,《南社文人与日本》之所以在众多的南社研究成果中独树一帜,首先是依赖于对相关资料的全面收集和使用。这既是脑力劳动,也是繁重的体力劳动。在写作过程中,春香教授还利用去日本访学的机会,在日本收集相关资料。可以说,《南社文人与日本》在史料的收集和利用上是十分充分的,共参考了近三百种中日文献,这就保证了论文的学术质量,也为读者提供了在其他书籍、文章中所见不到的文献信息。如田桐的《扶桑诗话》是笔者跑遍北京从国家图书馆古籍部查到的,之前很少被人注意到;叶楚伦的《蒙边鸣筑记》、郁曼陀的《静远堂诗抄》、《东京杂事诗》、《觉民》月刊等文献过去也很少有人进行研究;日文本的吉田松阴的《幽室文稿》及相关文献、景梅九回忆录《罪案》的日译本《留日回顾》等,在过去的研究中也几乎无人涉及。

从全书的定稿来看,作者以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的视角,把南社放到近代中日关系的大背景下,有系统、有重点地考察了南社作家的文学活动、政治文化活动与日本明治维新时期文学潮流、社会文化思潮之间的关系。全书分“绪论”、“苏曼殊与日本”、“高旭与日本”、“马君武与日本”、“郁曼陀与日本”、“南社其他作家与日本”、“南社的国粹主义与日本”、“南

社的国民性批判与日本”和“余论”九个部分,尽可能地将南社与日本相关的问题涵盖并予以廓清。作者既注意考察南社主要作家与日本文人的交往及接受日本明治时期文化思潮影响的情况,也注意考察他们经由日本接受西方思想、西方文学影响的情况,将实证性的“传播研究”方法和文本分析的“影响分析”方法结合起来,将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结合起来,探讨了苏曼殊、高旭、马君武、郁曼陀、陈去病、柳亚子、田桐、叶楚伦等南社文人的文化活动与日本的关联;梳理了与南社人有密切关系的清末国粹主义思潮和国民性批判思潮与日本的关系,并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观点与看法。本书使南社研究这一老课题得以更新、得以深化。其中,作者对过去没有或很少有人研究的高旭、郁曼陀、田桐、叶楚伦、景梅九等南社文人及其文学活动做了开创性的研究,如对叶楚伦小说《蒙边鸣筑记》抗日内容的研究;对苏曼殊、柳亚子、马君武等过去学术界有较多研究的南社文人则从中日文学与文化关系的新角度探讨了他们的政治活动、文学活动与日本的关系,发现其新的意义与价值,如对马君武在近代外国文学翻译介绍方面作用的研究,对于清末的一些社会思潮和文学思潮也结合当时的世界文化语境和中国社会现实做出了新的阐释,如对国粹主义思潮中日本影响因素的研究。该书为南社研究打开了一个新的窗口,具有创新意义和填补空缺的价值,对中国近现代文学的研究也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显而易见,春香教授具有很强的创新意识,她在写作的初期就深刻意识到了博士论文贵在创新。因此,《南社文人与日本》并不是对南社所有成员与日本之关系的全面考察与研究,而是要在材料的挖掘、问题的发现、事实的考证等方面尽量填补以往研究的空白与盲点。而对以往研究成果较多的问题,作者也不是要总结归纳既有成果,而是要发表自己从新的角度研究获得的新发现和新见解。大约是基于这种考虑,书中对个别

与日本有密切关系的南社文人(如李叔同)基本上没有涉及,这当然不是作者的疏漏,主要原因恐怕还是作者感到难以超越已有的研究成果,所以宁可略而不论,也不做一般化的综述。我想,这样做是值得推崇的,这也应该是该书与当下一些“专著”的不同之处。

总之,《南社文人与日本》是国内第一部从比较文学角度研究南社的专著,凝聚了作者近八年的心血。本来这本书早就成稿了,但春香教授一直置于案头,加以沉淀、打磨和修改,直到现在才拿出来出版。春香就是这样一个不慌不忙、不急功近利、井井有条的人,是一个不为外物纷扰、纯粹做学问的人。在当今中国高度行政化的大学里,这样埋头做学问的人即便被边缘化也罢,他们实为真正的大学精神的守护者,我引为同道,并希望读者朋友能在她的著作中,读出那种为发掘事实、为探求真理、为学术创新而孜孜以求、一丝不苟的精神与态度。

王向远

2013年4月21日

## 绪 论

南社的成立带有传统文人结社的色彩,但它的成员及其活动却与古代的文人结社大不相同,可以说南社是中国近代文学史上一个具有现代色彩的文学社团。

然而,它与现代文学意义上的社团又有着很大的区别。它没有共同的文学纲领,也没有相对一致的创作风格,使南社人走到一起的是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关注,是反满革命的政治要求。如柳亚子所说的那样:“天梅的诗派和我的不同,不过在以文学提倡排满的一点上,我们是志同道合的。”<sup>①</sup>他们倡立南社,就是为了“网罗当世骚人奇士,以挖扬风雅为革命先导。”<sup>②</sup>其实,“南社”这一名称就很能说明问题:“钟仪操南音,不忘本也。”(宁调元语)“南之云者,以此社提倡于东南之谓。”(高旭语)“南者,对北而言,寓不向满清之意。”(陈去病语)很明显,他们是以“南”表示对北方统治者的不满。从历史上看,南社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明末清初的复社、几社砥砺气节的传统,与明末清初的汉族文人反清斗争有一定的关联,他们也认为自己

---

<sup>①</sup> 柳亚子《我对于创作旧诗和新诗的经验》,见《磨剑室文录》下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1144页。

<sup>②</sup> 刘谦《宁调元先生事略》,见《辛亥革命史料选辑》续编,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11月,218页。

是继承了“几、复风流”；从现实角度看，南社与清末的反清革命组织同盟会、光复会关系密切，许多南社成员都曾参加过同盟会或光复会，南社的发起人和主要成员多是同盟会的骨干，柳亚子更是同盟会、光复会的双料会员。胡朴安在《南社诗话》中曾说：“同盟会在日本是做革命实际工作的，南社在国内是做革命鼓吹工作的。”<sup>①</sup>“南社本是与国民党先后组织的，国民党为革命实际之行为，南社为革命文字之鼓吹。民国成立，民党报纸，其任编辑者，多半是南社社员，常与非民党报纸，以笔墨相战斗。”<sup>②</sup>

因此，有人开玩笑说，南社简直就是同盟会、国民党的宣传部。话虽夸张，但却道出了南社最本质的一面。可见，无论从对传统的承续还是对现实的关照来看，南社都不是一个纯文学的社团，它带有相当强烈的政治色彩，它的成员也多是从事新闻、出版、教育、文艺创作等各种文化行业的人员。这就决定了南社在与国外的文化发生关联、在接受外来文化的时候，决不局限于文学角度，而是以其政治上的适用为原则，接受、吸收所有能为他们代言张目的文化资源。这也就决定了我们在研究南社与外来文化的关系时，不能从单纯的文学角度入手，而必须采用大文化的视野，否则就很难认识并理清它与外来文化的关系。

由于南社的文学提倡民族气节、倡导民族主义，所以研究者一般对它的定位是“民族主义”，学界很少或基本不谈它与外来文化的关系。其实，“民族主义”(Nationalism)这一概念和词

<sup>①</sup> 胡朴安、曼昭《南社诗话两种》，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3月，160页。

<sup>②</sup> 同上书，149页。

汇本身就是外来的。这一词汇在欧洲大约出现于15世纪初,它是欧洲近代历史上随着反宗教、反封建专制的斗争逐渐形成的(西方民族主义发展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建设民族国家的阶段,也就是由王朝国家向近代民族国家转变的过程),到法国大革命时期,近代意义的民族主义形成,<sup>①</sup>并很快成为一种社会思潮迅速传播。汉语的“民族主义”这一词汇来自日语,大约出现在19世纪末。<sup>②</sup>由于中国当时面临着外有西方列强和日本瓜分的威胁、内有满清王朝(当时汉人认为他们是异族入主)的专制统治这样复杂的局面,加上达尔文进化论的强大影响,民族主义在中国与固有的种族主义结合在一起,成为爱国保种、反清革命的最有力的号召,南社的民族主义无疑是具有这种色彩的。这也就是说,仅从民族主义这点看,南社也是一个与外来文化密切相关的文化团体。

产生于清末这一历史时期的南社,由于它与维新改良、反清排满的政治活动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这就已经决定了它与外来文化,尤其是与来自于日本的文化影响有着必然的联系。

这首先决定于中日甲午战争后,日本成为中国学习的榜样和输入西方文化的通道这样一种局面。19世纪后半叶,在西方咄咄逼人的进攻面前,日本先行一步进行了改革,甲午一战就充分展示了明治维新后日本开国进取、锐意改革的成果。战败激起了中国向日本学习的热潮,官派、自费前往日本留学、游学

---

<sup>①</sup> 李宏图著《西欧近代民族主义思潮研究》,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年3月,10页。

<sup>②</sup> 参见冯客著、杨立华译《近代中国之种族观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9月,100~101页。

的人不断乘槎东渡,以至于形成了赴“日本游学者相望于道”的景观。这些人中绝大部分属于中国传统社会中“士”这一阶层或他们的子弟,儒家治国平天下的传统在他们头脑中根深蒂固,甚至可以说是溶化在他们血液中的。他们留学日本对中国历史影响深远,这也是中国近、现代史上许多著名人物多出自留日学人中的一个原因所在。这些人具有以天下事为己任的观念与责任感,当他们发现依靠传统文化已不能治国平天下时,在外国文化中寻求批判和更新传统文化、寻求救国新民的资源就成为必然的选择。

在这浩浩荡荡的留日学人队伍中,就有不少是后来的南社成员。笔者根据郑逸梅的《南社丛谈》、柳无忌和殷如安的《南社人物传》、王学庄和杨天石的《南社史长编》做了粗略的统计,发现辛亥革命前后活跃于文坛、政坛和报界的南社成员中,有留日经历的就有70余人,如:陈去病、高旭、马君武、苏曼殊、宁调元、黄节、包天笑、张继、朱少屏、李叔同、冯心侠、刘三、沈尹默、钱玄同、吴虞、李根源、陈陶遗、刘成禺、邵飘萍、林白水、林寒碧、欧阳予倩、郁曼陀、费公直、俞剑华、雷昭性、邵力子、邵元冲、于右任、田桐、宋教仁、陈其美、黄兴、居正、戴季陶等。南社的创始人和主要作家除柳亚子外,都曾经留学日本。而且,近代留日潮中,中国留学生在日本创办的24种刊物中,有9种是由南社成员创办、编辑的。

其次,康、梁的改良派和孙中山的革命派都与日本朝野有着密切的联系,日本几乎就是晚清时期中国持不同政见者和反政府武装的大本营。虽然日本明里暗里扶持改良派和革命党是别有用心的,但作为流亡者而又要实现自己的理想,他们也

别无选择。日本与中国一衣带水的地理位置和“同文同种”的文化优势,也都是他们需要利用的资源。于是,清末中国的反政府派云集日本,也就是一种必然。

当时的改良派,不仅其主要舆论机构如《清议报》、《新民丛报》、《新小说》等都在日本,他们还在日本横滨办了“大同学校”,以培养人才;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成立于日本,其舆论机关《民报》社也在日本;清末中国无政府主义者刘师培等也在日本办《天义报》和“社会主义讲习会”等来宣传自己的主张。来自中国各地的留学生也在日本办了不少报刊,如高旭等江苏人参与编辑的《醒狮》(1905)、李根源等云南留日学生主编的《云南》(1906—1911)、景定成等山西留日学人办的《第一晋话报》(1905—1906)和《晋乘》(1907—1908)、河南留日学生办的《河南》(1907—1908)、湖南留日同乡会办的《游学编译》(1902—1903)、湖北留日学生办的《湖北学生界》(后改名为《汉声》,1903)、河北留日学生办的《直说》(1903)、浙江留日学生办的《浙江潮》(1903)、江苏留日同乡会办的《江苏》(1903—1904)等等。这些报刊不仅倡导呼吁中国社会的变革、介绍西方和日本的各种思想理论文化著作,也发表进步的文艺作品。报刊的编辑者和撰稿人,大多数随着中国改良派与革命党之间关于社会变革的论争和双方力量的消长,经历了思想上由改良到革命的转变,其中一大部分人成为同盟会早期的会员。

仔细查看,我们还发现,几乎每种刊物的主要撰稿人中都有后来的南社成员。这不仅决定了南社文学与中国反清革命紧密相关的品格与命运,也道出了为什么东南地区文人组织发起的南社中,会有四川、山西、云南等内陆省份和边远地区的人

加入的原因。正是日本这个平台使他们能够结识于反清革命的大旗之下。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形成的文学社团——南社，其思想、文化、文学方面和日本发生关系也就是一种必然。通过南社的主要作家及其活动来考察中国近代文学、文化与日本发生的关联，我们发现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

第一种是以日本为媒介、通道把西方文化、思想引入中国。南社人通过日本这个“二传手”，把日本翻译、介绍、接受的西方思想文化和文学著作接受过来，再传到中国。

日本当时是中国人了解西方的一个窗口，也是中国人接受西方先进思想文化的一个便捷、重要的通道。日本明治维新后从上到下的欧化运动，不仅模仿西方人穿衣吃饭，也学习西方的政治经济运行机制，还介绍、翻译西方不同时代的各种思想著作、文学作品。可以说，当时的日本汇集了西方几百年来积累下的思想文化成果。从思想理论方面看，从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到启蒙时期的天赋人权、自由平等思想，再到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女权主义；从法国的自由主义到德国的国家主义，几乎样样俱全。从文学方面看，从莎士比亚、拜伦、雪莱、王尔德到歌德、席勒、尼采，再到大小仲马、雨果、左拉，直至屠格涅夫、托尔斯泰、惠特曼、易卜生，欧美各国不同时代的作家、作品差不多都有介绍。当然，日本人的引进有点像“阿里巴巴和四十个大盗”中的强盗那样，觉得是好东西就一股脑儿先搬回来，放入“洞”中归为已有，需要的时候再从中选择；而当时中国人的情况就有点像闯入藏宝之洞的阿里巴巴，面对日本这样一个储满西方文化宝藏的“山洞”，有点儿眼花缭乱，不知如何选

择,难以确定哪些资源是自己急需的。

这时,中国人的办法就是观察、模仿,看日本人是如何选择和怎样吸收的,然后向他们学习。于是就出现了西方什么思想理论在日本流行,这些思想理论就会被介绍到中国;日本对西方作家、作品的评价侧重哪一方面,中国在接受和介绍时也同样会重视哪一方面的局面。例如:19世纪末无政府主义思潮传入日本并产生影响,20世纪初的1902年,正在日本的马君武就翻译了介绍无政府主义的《俄罗斯大风潮》。需要注意的是,日本思想界当时把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虚无主义和俄国民粹派思想等多种东西混在一起,统统称为无政府主义或社会主义,这不仅造成了日本思想文化界对这些思想分辨不清,还造成了中国对它们认识的混乱;明治一二十年代,日本把雨果作为一个政治作家介绍到日本,马君武、苏曼殊等在介绍、翻译雨果及其作品时也是这样看待雨果的;还是在明治一二十年代,拜伦与雪莱和他们的作品几乎同时传到了日本,但日本文学界对拜伦的重视程度明显高于雪莱,于是苏曼殊的拜伦、雪莱翻译、介绍,就明显呈现出这种态势。这表明,中国以日本为通道翻译、介绍的西方思想文化与文学,经过了日本这个过滤器之后,已经多多少少偏离了它的原态,带有了日本色彩。而中国的接受者们由于急于寻求救国的思想文化武器,根本来不及认真选择、分辨,更谈不上客观的研究态度。因此,这一时期介绍、翻译的西方文化、文学著作,可以说大多都带有某种程度的日本色彩,是不完整、不完全的,对其认识也是不够客观、不够实事求是的。

第二种是与日本本土的文化现象及思潮发生共鸣进而接

受其影响。由于历史上日本曾长期大量接受中国文化,因此,日本的传统文化中总有一些在中国人看来似曾相识、感到亲切的东西。如:幕末时期在和西方对峙中日本人所表现出的华夷观念,知识分子的以天下事为己任的使命感、气节,还有日本知识阶层的汉学修养、写作汉诗文的能力等等。这都使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尤其是像南社成员那样的、未完全摆脱中国传统的“士”这一阶层特点的人,对之心仪、向往,并产生强烈的共鸣。高旭、梁启超等受日本幕末志士吉田松阴的思想、人格的影响,以及南社成员对日本国粹主义的接受,很大程度上就是受这些因素的影响。由于这样的文化背景,再加上清末中国反清排满的政治革命的需要,在当时民族主义激情的支配下,他们接受吉田松阴思想、日本国粹主义思潮的影响时,基本是遵循实用主义的原则,取我所用,而对其文化思想根本不去、或者根本就不想去进行全面的了解。因此,他们有意或无意地忽视了一些东西,如:吉田松阴的侵略性和日本国粹主义思潮中的国家主义倾向。吉田松阴留下了大量的、赤裸裸的对中国存有野心的文字,但是从康有为、梁启超到高旭,他们都对吉田松阴推崇备至,也写过不少赞美、钦佩他的文字,唯独对这一点只字不提;日本国粹主义思潮的代表人物中有不少是有强烈的国家主义倾向的,但中国的国粹派在接受其思想文化主张时避过这一点,完全忽视了它的存在。

如果说上述两种南社与日本文化的关联主要是接受,并且接受的方式受当时中国政治革命形势的支配,服从于政治需要,采取的是实用主义的、非学术研究的态度的话,那么,另外两种南社与日本文化发生关联的情况则稍稍接近文化、文学自